

第四十一回

孙文重建国民党 执信殉职虎门滩

话说 1913 年 3 月 20 日深夜，热闹繁华的上海，经过一整天的喧嚣与折腾，已经安静下来，忙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，也疲惫地进入梦乡。火车站候车的旅客，大多没精打采，东倒西歪。然而，在火车站一角的议员休息室里，国会议员、国民党理事长、年仅 31 岁的宋教仁，却身穿袁世凯送给他的 3000 元大洋一件的特制西服，脚穿一双擦得油光发亮的高级皮鞋，脸上神采奕奕，毫无倦意，在这夜深人静之际，他正在与国民党领导人黄兴、廖仲恺、于右任等人高谈阔论。

各位读者，宋教仁为何在此？原来，袁世凯窃取政权以后，迫于形势的压力，不得不同意实行议会政治。经过唇枪舌剑和激烈的较量，国民党在选举中击败了袁世凯支持的共和党、民主党和统一党等所有对手，大获全胜。宋教仁此番上京，正是以国民党理事长的身份北上京师组织内阁，意欲出任国务总理，以一展其鸿鹄之志。眼看自己的理想即将变成现实，多年来的艰苦奋斗终于结出了硕果，他不禁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，喜悦之情自是溢于言表。面对前来送行的黄兴等人，他信心十足地说道：“国民党是议会中的第一大政党，占据绝对优势，政党政治将指日可待，袁世凯很快就会成为有职无权的民国总统。纵使他有三头六臂，狡诈绝伦，也再难兴风作浪。只要我们好好地控制国会，就完全能够驾驭住这匹桀骜不驯的野马。如果他还不识时务，肆意捣

乱，我们就通过民主选举，把他赶下台去，另选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大总统，组织同志内阁，将政权牢牢地掌握在国民党手中。”

黄兴等人个个都陶醉在胜利之中，只有于右任，近来听到不少关于袁世凯已派出刺客准备刺杀宋教仁的流言，面呈忧虑之色。他忧心忡忡地说道：“袁世凯心狠手辣，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！你此次上京，一定要多多小心，注意安全。”

宋教仁听罢，哈哈大笑：“于兄，现在已经是民国了。袁世凯何必出此下策？！你不必多虑，还是静听佳音吧！”

宋教仁抬起手腕，一看手表，已经是 10 时 45 分，离开车时间只有 15 分钟了。他便与黄兴、廖仲恺、于右任等人信步走出议员休息室，直奔检票口。

宋教仁递上车票，转过身来与黄兴等人一一握手道别。

就在这时，早已埋伏在车站黑暗角落里等候多时的刺客武士英，乘人不备，迅速从怀里掏出装有消音器的微型手枪，对准宋教仁就射。只听见“砰、砰、砰”3 声微弱的枪响，宋教仁的身躯剧烈地摇晃了几下，便应声倒在旁边的一张铁椅子上。他用手按住鲜血直流的胸部，轻轻而镇静地说道：“我中弹了……”随即昏迷了。

于右任等人大吃一惊，顾不得捉拿凶手，赶忙将宋教仁扶上停在附近的汽车，就近送往铁路医院抢救。凶手则趁人们手忙脚乱之机，借着夜幕的掩护，逃之夭夭。

手术当夜进行，医生从宋教仁的身上取出了一颗带有剧毒的子弹。宋教仁气息奄奄，几度昏迷不醒。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，用手揩了揩额头上豆大的汗珠，忍着剧烈疼痛，勉强挣扎着说：“我这次北上的目的，是要竭力调和南北意见，以便集中力量一致对外。”停了一停，又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道：“我调和南北

的苦心，世人不谅，我死不瞑目！”由于剧毒发作，到 22 日凌晨 4 时 47 分，这位叱咤风云、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民主革命斗士，带着极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。

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“刺宋案”。

却说坐镇北京总统府的袁世凯，在 21 日得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，嘴角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。他表面上不露声色，装作十分惊讶和不胜惋惜的样子：“竟有这种事？快拿电报来！”看完电报，他勃然大怒地对身边幕僚说道：“遯初（宋教仁的字），中国特出之人才也。再阅数年，经验宏富，总理一席固胜任愉快者。何人狂徒，施此毒手！”然后又施出贼喊捉贼的惯用伎俩，煞有介事地发布了一道堂而皇之的大总统令，飭令江苏都督程德全、民政长应德闳和上海地方官、沪宁铁路总办：一定要“迅缉凶犯，穷究主名，务得确情，按法严办，以维国纪，而慰英魂。”他又立即派陈贻范代表自己前去上海探视奄奄一息的宋教仁。为了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，他又授意手下散布谣言，诬为陈其美所杀，以便使国民党人自相残杀，自己坐收渔人之利。

袁世凯自以为这一着棋天衣无缝，完全可以瞒天过海。哪里想到，就在他得意洋洋忘乎所以之际，3 月 23 日，上海古董商王阿发大汗淋漓地来到上海租界捕房，主动报告了这样一条线索：“一星期前，因出售字画，我到小西门外应夔丞处，应出示一张照片，说是如能谋杀照片上这个人，可得 1000 元赏金。我无此能力，当即将照片交还给他。今早看见各报所登的宋教仁的照片，与一星期前所见照片完全相同，特来报告。”捕房立即派出大批巡警赶赴应家。结果却搜出 1 支 5 响手枪以及应氏与特务头子洪述祖、国务总理赵秉钧往来的电码密本和函电等证据多件，并逮捕了前来应家领赏的凶手武士英。此时，应夔丞怀揣大把钞

票，正在一家高级妓院里寻欢作乐，逍遥过夜，侥幸逃脱。

再说上海当局，奉了袁大总统的圣旨，哪敢怠慢，立即审问凶手。武士英虽是亡命之徒，但血肉之躯究竟难敌钢铁刑具。在严刑拷打之下，很快就供出了实情。上海当局和国民党人顺藤摸瓜，布下天罗地网，经过大力调查，案情很快就真相大白：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是武士英，同谋犯是应夔丞，指使是洪述祖，主谋正是大总统袁世凯本人和国务总理赵秉钧。

袁世凯得报，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大骂赵秉钧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他急得茶饭不思，坐卧不宁，倒背双手，在屋里来回走个不停，急思补救之策。经过周密思考，袁世凯指派心腹特务毒死了关在狱中的武士英，使国民党失去了人证。应夔丞一看大势不妙，立即化装潜逃，但哪能逃出袁世凯的掌心！没过几天，他就在津浦铁路上遇刺身亡。国务总理赵秉钧也突然七窍流血，糊里糊涂地上了西天。

为了把水搅浑，蒙混过关，袁世凯又指使特务布下迷魂阵，多方收买假证人，反诬宋为国民党所杀。1913年3月的一天，一个叫周徽予的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学生，大摇大摆地来到京畿执法处“自首”。她自称是“女子暗杀团团长”奉“血光团团长”黄兴之命，在北京、天津一带组织暗杀机关，暗杀政府大员。北京警厅如获至宝，为了立下头功，以此为借口，四处搜捕革命志士。古老而宁静的北京城，顿时被闹得鸡犬不宁，人人自危。

上海检察厅也唯恐落人之后，立即票传黄兴到庭对质。黄兴哈哈大笑：“这个把戏倒也变得好！”他一传就到，并以法庭为讲坛，揭露袁世凯的种种罪行。他还保证随传随到。检察厅一无所获，只好不了了之，各种流言蜚语，终于不攻自破。

再说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，接到宋教仁遇刺身亡的噩耗，

气得长吁短叹，怒目圆睁，拳头捏得格格作响。他立即打点行装，启程回国。3月25日，孙到达上海，与黄兴等人筹划武力讨袁之事。经过一系列准备，1913年7月12日，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，率先宣布独立；7月15日，黄兴在南京成立江苏讨袁军，自任总司令，宣布江苏独立。安徽都督柏文蔚、湖南都督谭延闿、广东都督陈炯明以及福建的许崇智、上海的陈其美、重庆的川军司令之一熊克武等人也都纷纷起兵讨袁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“二次革命”。

但是，由于袁世凯蓄谋已久，早有准备，而且兵精粮足，又有列强大力扶持；国民党则四分五裂，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，各地讨伐军各自为战，互不联系，在袁家军的大举进攻面前，国民党很快就败下阵来。国民党拥有的南方各省地盘，不久之间化为乌有；三四十万大军，立时毁于一旦。孙中山、黄兴等国民党领导人被迫再度流亡海外。

却说孙中山流亡到日本以后，国民党内的一些见利忘义之徒，为了谋取高官厚禄纷纷屈服于袁世凯的淫威，死心塌地地为其卖命效力，一些人为袁世凯的汹汹气势所吓倒，心灰意冷，意志消沉，开始退出政坛，脱离革命，甚至隐居山林，国民党成为一盘散沙。孙中山痛心疾首，但又无可奈何。万般无奈之中，他决定忍痛割爱，抛弃国民党，重新组建一个主义明确、组织坚固、纪律严明的强有力的中华革命党。他还郑重声明，全体党员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孙中山一人，入党时必须举手宣誓：“立誓约人×××，为挽救中国危亡，拯生民困苦，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，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……1. 实行宗旨；2. 服从命令；3. 尽忠职务；4. 严守秘密；5. 誓共生死。从兹永守此约，至死不渝，如有二心，甘受极刑。”并加盖指模，以防假冒。

不料，孙中山的这一主张尚未出台，就遭到了国民党人的群起反对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

黄兴首先表示异议：“我们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上刀山，下火海，不就是为了浇灌自由之花，追求民主平等吗？我们革命，是为了振兴国家与民族，要大家都服从您一个人，这恐怕有些不妥吧！誓词上的‘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’一语，也不够民主和平等；入党加盖指模，更是近人身侮辱。”并要求孙中山取消这一不合时宜的规定。

国民党内向来视孙黄为一体，黄兴位于一孙之下，众人之上，影响举足轻重。过去，孙中山对黄兴言听计从。可是，自“刺宋案”以后，因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，黄兴大唱反调，主张法律讨袁，两人从此不和。孙中山见黄兴这次又带头反对，好不生气！当下便冷冷地答道：“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，关键就在于党员不服从党的领袖。既然你不同意，也不必勉强，看在我们过去多年交情的份上，看在革命的份上，让我一个人来试一试。不知可否？”

黄兴见事已至此，还有何话可说，只好点头同意，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寓所。后来，黄兴去了美国。这是后话，顺此交待。

但是，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，对孙中山的这一举措大多强烈反对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，还想趁此机会另立山头，以分裂革命力量，孤立孙中山。

在这互不相让、僵持不下之时，有人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，凡是老同盟会会员，都不必宣誓，誓词中的“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”改为“附从总理再举革命”以示服从党的领袖而非个人。

孙中山正准备让步，不料陈其美不失时机地站了起来，朗声说道：“孙中山，您是最伟大的人，由您统治中国是天经地义的

事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，哪有您这样的人！”然后带头宣誓、盖模。孙中山脱口而出：“陈其美是最了解我的人！”态度又转趋强硬，拒绝妥协。

经过将近一年左右的酝酿和筹备，1914年7月8日，孙中山等300余人在日本东京筑地的精养轩召开大会，成立了中华革命党。孙中山由胡汉民主盟，陈其美、居正两人介绍，当众宣誓入党，并加盖指模。然后，又在一片欢呼声中，宣誓就任中华革命党总理。

矫枉毕竟不能过正。孙中山如此一来，许多有识之士都驻足门外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。中华革命党实际上成了一个秘密的狭隘的革命小团体，影响极其有限。在1915年的护国战争中，中华革命党除了发出几道宣言、通电和发动一些零星的武装起义外，再无成就；1917年7月，孙中山掀起了护法运动，但不到一年，由于备受西南军阀排挤，只好愤然出走，与朱执信等人返回上海。

革命的连连失利，使一些干部党员感到前途渺茫，开始悲观失望。

一天，马逢伯走到孙中山那里，吞吞吐吐地询问孙中山的生辰八字。

孙中山十分纳闷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便反问道：“你想知道这个干什么？”

马逢伯满脸涨得通红，欲言又止，在孙中山的一再追问下，只好和盘托出。原来，好些同志因屡屡失败而感到十分迷惘，其中，有几个自称精通算“八字”的人，很想知道孙中山出生的年月日，以便推算出他何时才能时来运转，完成民主革命，但他们不敢当面问孙中山。由于马逢伯曾经当过孙中山的警卫员，参加过

孙中山组织的讨袁敢死队，与孙中山情深谊厚，众人便托马逢伯前去打听。

孙中山一听，真是啼笑皆非，十分生气地说道：“你们年青人为什么也这样迷信，竟相信‘八字’这一套。难道我的‘八字’不好，你们就不想革命了？你回去告诉他们，我的‘八字’，就是‘打倒军阀，继续革命，！’”

孙中山回到上海后，与朱执信、廖仲恺、马伯麟、马湘等人住在上海环龙路 63 号。

一天，4 位旅美华侨特地慕名前来拜访孙中山。他们看到室内的陈设如此简单，房子如此破旧不堪，十分惊讶。临别告辞的时候，他们拉着侍卫长马湘的手悄声问道：“孙中山先生住的房子太不像样子，是他自己的么？”

马湘沉默片刻，只好如实相告：“不是他自己的，他哪里有房子？这房子每月还要付 65 元租金呢！”

4 位华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又问了一遍，连连叹息道：“世界上只有孙中山是好人，哪里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？我们一定要替他想想办法。”

这 4 位华侨正准备在上海开办一家化妆品工厂，经过商量，一致决定拿出一笔钱来买一套像样的房子送给孙中山。左挑右选，最后选中了莫利爱路 29 号（今香山路 7 号）1 所住宅。

孙中山听了，又是摆手，又是摇头，连声说道：“送房子给我么？不可！不可！我凭什么接受你们这样重的礼物？”

4 位华侨搜索枯肠，再三解释。孙中山违拗不过，最后只好答应下来，住宿条件这才有了较大的改善

回到上海后，孙中山不仅政治上深受失败的煎熬，子然无助，经济上也十分拮据。家中平时有好几个人吃饭，一天却只有

2元菜钱。

一天上午，老友唐绍仪来访。两人相谈甚欢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。孙中山留他吃午饭，还特意吩咐马湘到趣乐居买了一只卤水肥鸡款待贵宾。唐绍仪狼吞虎咽，三下五除二，不一会儿工夫就把一只鸡吃完了。他满以为好酒好菜还在后面，便放下筷子，耐心等待。

孙中山见此情景，十分为难，只好抱歉地说：“简慢得很，没有什么好的菜款待。”回过头来又问马湘：“马湘，还有什么菜？”

马湘应道：“厨房里只有咸鱼。”

孙中山只好吩咐：“咸鱼也可以拿出来吧。”

当时，上海达官贵人宴请宾客，都是山珍海味、美酒佳肴。唐绍仪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孙中山生活如此简朴，满脸涨得绯红，一边用咸鱼下饭，一边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我大吃惯了。一只肥烧鹅，我一餐可以吃完，因此家里虽只有几个人，每餐菜钱便是10元啊！”

一次，一位旅居上海的美国中将专门邀请孙中山到家中晚餐。孙中山雇了一辆马车，与马湘一道应约前往。但事不凑巧，走到半路上，车轮忽然坏了。这时，天又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孙中山浑身上下淋得湿漉漉的。马湘到门前一按门铃，没有人开门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按了按电铃，门开了一道小缝，一个人探头探脑地向外张望了两下，便又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大门。马湘透过矮矮的院墙，看到石阶上一个外国人正在举目张望，便操着英语大声喊道：“孙博士来了！”

主人闻声，立即三步并为两步，亲自上前开门，和孙中山热情握手，互致问候。

门卫大惑不解，把马湘拉到一旁，悄声问道：“孙博士是什么

人？”

“孙博士你都不知道么？他就是孙文。”

门卫猛地瞪大了双眼，惊奇地说道：“原来就是报纸上常常登载的孙文！他为什么不坐汽车呢？到这里访问的人没有不坐汽车的。刚才门铃响，因为没有听到汽车响声，我还以为是小孩捣蛋，所以没有开门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多多原谅。”

为了顾全面子，马湘只好隐瞒实情：“本来是坐汽车来的，但到了街口，汽车坏了。”

正是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政治上的惨痛失败，经济上的严重困难，并没有压垮孙中山，他以极大的毅力，忍受住了失败的煎熬。在经过思考之后，他又开始了新的奋斗——改组国民党。他认为，中华革命党已无力肩负起领导革命的历史重任，国民党虽然成分复杂，但党员众多，影响极大，在国会中占居多数。只要以中华革命党的精神去重新武装国民党，给她注入新鲜血液，就可使国民党获得新生，挑起领导革命的千钧重担。

为了给即将建立的中国国民党打下坚实的基础，确定政治、思想指导方向，彻底清除人们心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和消极思想，孙中山不惜余力地从事理论著述。他常常成天呆在书房里，孜孜不倦地查阅各种资料，掩卷沉思各种重大问题。他伏身案头，奋笔疾书，经过 400 多个日日夜夜的奋力苦战，写成了《孙文学说》和《实业计划》两部宏篇巨著。后来，孙中山又将它们和 1917 年写成的《民权初步》合成一部著作，定名为《建国方略》。

经过充分酝酿和精心筹备，1919 年 10 月 10 日，孙中山正式布告海内外，宣布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，同时还颁布了《中国国民党规约》，规定：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、实行三

民主义为宗旨；自即日起，中华革命党总章和各支部通则一律废止，所有印章图记，全部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；凡中华革命党党员，一律直接转为中国国民党党员，以中华革命党证书换取中国国民党证书；凡赞成党的宗旨、经党员两人介绍，均可申请入党；党员必须信守党的宗旨，按时交纳党费（入党时交纳 10 元，以后每年交纳 1 元）；党员享有各种民主权利，但必须遵守党的纪律；党在上海设立本部，由总务部、党务部、财政部 3 部组成，全党设总理 1 人，由大会选举产生，总揽全党事务，各部设主任干事、副主任干事各 1 人，由总理直接任命，任期 2 年，下设总支部、支部、分部。10 月 13 日，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身份委任居正为总务主任，谢持为党务主任，廖仲恺为财务主任，着手建立各地的组织机构，大量吸收党员。

中国国民党建立后，经过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辛勤耕耘，中国革命开始走出低谷，进入了复兴阶段。1920 年 8 月，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，率领援闽粤军从漳州班师回粤，揭开了驱桂战争的序幕。此是后话，容后详述。

单说驱桂战争打响以后，为了最大限度地牵制和孤立桂军，减轻正面粤军的压力，孙中山委任朱执信为讨贼军总指挥，负责策动各地民军和地方团队起义，朱执信欣然应命。他在香港东京酒店设立秘密指挥部，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各派军人之间，策动他们弃暗投明；又派人与美国军火商秘密谈判，购买美国飞机，准备攻打虎门要塞。

虎门扼珠江出口，是广州的第一门户，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虎门的守军是丘渭南的肇军。原来，1919 年春桂系军阀莫荣新出任广东督军，广东的肇军大多被遣还乡里。只有冯德辉营被桂军第三旅旅长兼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收编。肇军备受歧

视和排挤，早就十分不满，同桂系离心离德，要塞司令丘渭南原本一介商人，素不知用兵。经过朱执信的多方奔走与大力争取，1920年9月16日，虎门守军在丘渭南率领下宣布独立，公开反对桂系据粤。

与此同时，在国民党人邹鲁的策动下，东江民军邓钧也率部在东莞起义，由于彼此缺乏联系，不通讯息，邓军在占领太平镇后，连夜进袭虎门，准备一举攻下虎门要塞。虎门守军仓猝应战，被迫后撤，数十名守军缴械被俘。

双方势同水火，互不相让，大有一举火并之势。在这紧急关头，双方都要求有着崇高威望的国民党领导人朱执信出面调解。

许多人都为朱执信的安全担心：“降军成份复杂，刚刚反正，极不可靠，现在胜负还未见分晓，万一他们翻脸不认人，发生意外，那可怎么办？”他们纷纷劝阻朱执信前往邓营。

朱执信又何尝不知此行如探身虎口，风险极大，但是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粤桂两军正打得难分难解，如果不抓紧时机及时处理好这一冲突，协调各方力量，就会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，正在准备起义的各地民军和反正的地方团队就会观望不前。他坚定地表示：“只要于大局有补，个人安危何足计较？”他婉言谢绝了同志们的好心劝阻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在何振的陪同下，于9月21日来到东较场邓营商谈。

邓钧早就对朱执信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今见他为调和两军冲突，毅然冒险前来，更为他的大义所打动。在朱执信陈说利弊得失以后，邓钧便爽快地表示：愿以大局为重，服从朱执信的调停与建议，送还所缴降军枪械，退出所根据地盘，接受朱执信指挥。

朱执信正准备起身离开，到虎门向冯德辉等人通报佳音，进行疏通解释。但就在这时，冯德辉趁民军防备松弛之机，忽然率

领大队肇军包围了民军营房，袭击民军。霎时，枪声大作，弹如雨下。

一名民军士兵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道：“肇军已经包围了我们，现在已经打起来了，弟兄们死伤很多。”

邓钧大吃一惊，立即道：“传我的命令，叫弟兄们给我顶住，保护朱总指挥突围！”

朱执信没有料到降军不早不晚偏偏会在此关键时刻突然反水，令他功亏一篑。朱执信此时当然可以一走了之。可是，民军将士怎么办呢？为了避免两军自相残杀，他决定冒死一试，以自己的威信去制止这场混战。他大步走出房门，边走边扬手高呼：“我是朱执信，我是朱执信，请不要开枪！”邓钧也跟着跑了出去。

冯德辉万万没有想到朱执信在此，一时竟没了主意，两方官兵也都自动停了火，瞪着大眼盯着朱执信。阵前顿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。

冯军的一位连长早就想干掉朱执信，好到桂系军阀面前邀功领赏，趁朱执信未留意的当儿，端起机枪便向朱执信扫射。朱执信胸部连中数弹，鲜血直淌，终因失血过多而壮烈牺牲，死时年仅 36 岁。民军首领邓钧也一同遇难。

朱执信才华横溢、精力过人，具有超人的胆识和毅力，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，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，又是国民党内屈指可数的理论家、文学家和身体力行的实干家，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孙中山接到噩耗，不禁潸然泪下，失声痛哭，沉痛地说：“执信忽然殁折，使我如失左右手！我党失此长城，即使尽歼桂贼亦得不偿失！”

朱执信遇难后，何振、周之贞等人历尽艰辛，将他的灵柩从虎门运抵香港，易棺重殓。他们将灵柩停放在东华庄内并置灵堂，以供人们瞻仰、吊唁。粤军驱桂战争结束后，12月15日，护法军政府又指派专人将朱执信的灵柩用军舰运回广州，于16日安葬在广州沙河驷马岗（今先烈路），孙中山亲自步行执紼，上万群众前往送葬。1921年1月23日，护法军政府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，孙中山亲自主持追悼大会。

为了纪念朱执信的丰功伟绩，激励后人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进，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“执信学校”。孙中山在百忙之中亲临学校参加开学典礼，勉励师生化悲痛为力量，完成朱执信的未竟事业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。

第四十二回

陈炯明班师驱桂 大总统宣誓就职

话说 1920 年 8 月 1 日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人控制下的护法军政府，出动 10 万大军，以沈鸿英为总司令，分兵三路，铺天盖地般地直奔福建漳州而来。桂军粮弹充足，来势汹汹，大有一举消灭粤军之势。

驻守福建漳州的 25000 余名粤军健儿，早就想打回广东，为民除害，替孙中山报仇雪耻。他们义愤填膺，纷纷摩拳擦掌，主动请缨杀敌。孙中山分析天下局势，权衡利弊得失，果断决定立即全线反击，密令驻守漳州的援闽粤军火速整装迎敌，班师回粤，打回老家。粤军总司令陈炯明，深知妥协让步已无济于事，倘若再迁延不决，就会全军覆没。他遵照孙中山的命令，立即进行军事部署和临战准备。1920 年 8 月 12 日，援闽粤军在漳州市漳州公园正式誓师讨桂，分兵 3 路迎敌：以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为右翼军总指挥，统率所部第二军从上杭、永定出发，进攻蕉岭、大埔，直趋梅县、兴宁；以粤军参谋长邓铿为左翼军总指挥，率领洪兆麟、梁鸿楷等部，从云霄、诏安出发，攻取澄海、汕头；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兼中路军总指挥，率李炳荣、邓本殷、熊略、罗绍雄等部进攻饶平、潮安，突破丰顺，并策动左右两翼，浩浩荡荡地直冲桂军而去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桂战争。

各位读者，可知上文所谓“援闽粤军”缘何而起呢？说来话长。1917 年 7 月，为了捍卫《临时约法》，孙中山毅然由沪赴

粤，筹建西南护法根据地。9月10日，他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护法运动。但是，由于孙中山没有建立起一支忠于革命、服从自己、指挥自如的革命武装，虽身为陆海军大元帅，却难以调动一兵一卒，命令难出帅府一步。孙中山受够了西南军阀的窝囊气，尝够了酸甜苦辣的滋味，早就想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。

正在这时，倾向革命的广东省长朱庆澜，为了结好于孙中山，主动向胡汉民提出：“护法行动是正义之举，孙先生登高一呼，西南各省闻风响应。但是，要真正打倒北洋军阀，扫清帝制余孽，光靠首鼠两端的西南军阀，恐怕难以济事。还必须建立一支强大而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。如果孙先生有意建立护法军，我朱某愿将广东省警卫军拨出20营改为省长公署亲军，由陈炯明担任亲军司令，归大元帅直接统辖，以后再谋发展。”他还表示，军队建立后，可定名为粤军，为了好去打福建，可以定名为“援闽粤军”，以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，邓铿为参谋长。

朱庆澜这一义举，无异雪中送炭。孙中山自是欣喜万分。陈炯明虽官至广东都督，衔授堂堂陆军上将，曾统率广东三军，威风凛凛，炙手可热，但后因兵权易手，门前冷落，再也无人看重。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，他深深地体会到，有兵就有权，有了军队就能够拥有一切。为了掌握军队，他心甘情愿屈居朱庆澜之下，同意担任这一并不显赫的省长公署亲军司令。

桂系军阀广东都督陈炯焜得报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乱转。孙中山手无一兵一卒都难以对付，如果建立起他自己的军队，今后我还能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吗？一旦护法军羽毛丰满，自己几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卧榻之地，岂不是要让给他人酣睡，反倒使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不成？一想到这些，他就不寒而栗，浑身起

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当朱庆澜向陈炯明办理移交手续之时，陈炯焜乘其不备，出其不意地派出大批军队把陈炯明的司令部围得水泄不通，并强行缴去关印。陈炯明一看大势不好，赶忙化装潜逃香港。一场亲军司令之梦就此匆匆结束。事后，桂系军阀又一手导演了省议会的省长选举，将李耀汉赶出了广东。陈炯焜不费一枪一弹，就将朱庆澜的 40 营警卫军全部据为己有，援闽粤军还未正式建立，就胎死腹中。

陈炯焜如此放肆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孙中山决定奋起反击，让他尝尝厉害。1917 年 1 月 15 日黄昏，孙中山密令广州各军，以炮响为号，共同出兵讨伐桂军。他还冒着严寒，深入炮兵阵地，亲自到中流砥柱炮台指挥发炮轰击督军署。由于炮是 30 年前的旧式老炮，药包潮湿，燃不着火，炮轰陈炯焜的计划才宣告流产。

桂系头子陆荣廷为了缓和同孙中山的紧张关系，表示了让步，改派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。为了保住乌纱帽，讨好孙中山，莫荣新将 20 营警卫军拨还陈炯明，准许建立“援闽粤军”。陈炯明随即在广州越秀南路的惠州会馆设立总司令部，自任总司令，并以邓铿为参谋长，将 20 营军队编组为 5 个支队、1 个预备队、1 个游击队，以李炳荣、许崇智、罗绍雄、邓本殷、洪兆麟分任支队司令，熊略为预备队司令，徐连胜为游击司令，分别驻扎在惠州、潮州、梅州等地，进行补充和整训。

援闽粤军建立以后，莫荣新不仅停发军饷，还唆使滇军方声涛所部故意寻衅滋事，扰乱粤军后方。在前方，段祺瑞的北洋大军又源源不断地开赴福建，援闽粤军腹背受敌。为了闯出一条生路，根据孙中山的指示，1918 年 6 月 10 日，援闽粤军在广东惠州誓师，分兵 3 路进军福建，揭开了援闽战争的序幕。